

深 泽 赋



政协深泽县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八月

序

建制于汉代的深泽，有灿烂的现代历史，灵秀富饶的川原，物华天宝的产品，脱颖而出的济济人才——专家教授，艺苑群芳、体坛新秀。如此深泽佳胜，壮阔滹沱阅尽；诸多深泽儿女：报效祖国的精诚、炽爱事业的情愫、进取的锐意、成材的道路，严谨的态度、丰硕的成果，蜿蜒磁河饱览。凡此种，倘能撰文成书，必能激励和鼓舞深泽人民热爱之情，自豪之感，振兴之志，奋进之行。

有鉴于此，深泽政协的同志，则博采众议，反复拟定纲要；致函全国，拳拳约稿索传；奔赴各地，谦恭辑采询访；呕心沥血，精心编撰。初稿既成，则两次刻印成册，再三聆听众议，并择善而从，三易其稿。

历时二年，书稿始成，现将付印，嘱我作序。我嘉其以勤勉工作为全县人民做此有益之事，故欣然命笔，是为序。

甄树声

1987年3月

目 录

富丽川原	(1)
灿烂历史	(3)
我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王钰同志	(6)
孙敬之传略	(9)
王静如教授	(19)
年逾花甲志未酬	
——在我成长的道路上	(23)
不畏劳苦，一生攀登	(53)
王葆真先生轶事（节录）	(55)
医林春秋	(65)
一代名医王易门	(74)
春蚕到死丝难尽	(76)
王焕初教授小传	(79)
寄语乡亲话经历	(82)
生平简述	(91)
名列前茅	(96)
简述经历报家乡	(97)
我的生活经历	(106)
只问耕耘	
——记作曲家李遇秋	(116)
他把爱献给了事业	(120)
袁克忠传略	(123)

舞台生涯四十年

——记著名演员赵志英	(126)
张鹭 尚文	(134)
为国争光的人	(136)
创续新运会 为国育良才	(140)
小小象棋大师	(143)
柔道新秀	(146)
金牌在闪光	(149)
物华天宝	(152)
后记	(156)

富丽川原

王振兴

冀中平原，滹沱河旁，有一块美丽富饶的地方。它有富丽川原，它的人民勤劳、智慧、坚强。这就是人杰地灵的深泽县，一个令人向往的富庶之乡。

春风和煦，天高地阔，如砥坦荡。四通八达公路上，车水马龙，如梭来往。穿过河畔花果园，迎来路边杨柳行，再驰西南百余里，便是省会石家庄。登高远眺，满眼都是绿，遍地披彩装。麦高齐腰，机声悦耳铿锵，泵口涌飞浪。面对春光，心里甘甜似蜜，神色无比欢畅。

夏日河渠，粼粼波光。五堤杨柳依依，田野一片金黄，恰似无际的海洋。起伏麦浪，冲荡着初升太阳。打麦场上，欢声笑语，马达轰鸣，奏出丰收的乐章。

秋高气爽，金风送凉。它掠过树林，在田野上扬波鼓浪，吹送来高产的喜讯，增添韵味给这“争秋”的大好时光。户户挥镰，人人放声歌唱。歌唱那玉米棒大，稻谷穗长。歌唱那绿叶丛中，银花朵朵，犹如夜空繁星，闪闪发光。

瑞雪纷飞，堤岸杨柳满银花，茫茫原野披素装。天寒滴水成冰，房舍炉火旺。收音机旁，巧手男女编织忙，花篮、铁筛、草帽、荆筐……，一件件产品，畅销国内，远泊重洋。

深泽大地美如画，深泽人民多豪强。对如画四季，生无尽遐想。

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古老地方。远在汉朝，“南深泽”县城座落在今县城东南十二公里的地方。北齐时建制撤消，隋朝开元六

年，又置深泽县：深泽历史源远流长。悠悠数千年，名胜古迹载志章。香泉书院里，可瞻望文昌塔影长；回眸西望，古朴同济拱桥，载据磁河上；登临北极台，全城景色尽一望；俯视东南方，雕梁画栋文庙殿堂……

滹沱南环流，磁水、木道北绕淌。夏日水溢，几成泽乡。世代水患，洪水茫茫。官绅盘剥，深泽人民历尽苦难，几经沧桑，似陷深渊万丈。一九二五年深泽有了共产党，领导人民反官绅，驱逐日寇，推翻蒋帮。党领导人民在烈士鲜血染红的土地上，填平了弹坑，铲除沟网，分了土地，医治了创伤，劳苦大众得解放。深泽川原更坦荡。党领导人民，奋战数十年，治理了三河，筑起了堤防，修河渠，打机井，平地划方。旱能浇灌，涝能排放。十一届三中全会闪金光，新经济政策暖心房，科技普及推广，连年丰收增廪仓。“深泽”旧名赋新义，再不是水深泽乡，而是党深恩厚泽，使她变成繁荣富庶之乡，人民生活蒸蒸日上，逐年奔向小康。

深泽灵秀川原美，历久人才数无量，革命英雄，国家栋梁，教授学者，医林高手，艺苑名家，体育健将……，他们是深泽县人民的骄傲，他们是祖国赖以兴旺发达的力量。

美丽的深泽，富饶的家乡，人益智，志益扬，在“四化”征途上，定会谱写出更壮丽篇章。

一九八六年九月

灿烂历史

王国章

古老的深泽有着灿烂的历史。深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争取人民的解放，为夺取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革命战争中深泽县涌现了大批革命干部，据不完全统计，仅中高级干部就有三千余名。革命先辈前赴后继，英勇奋争，业绩昭彰，革命英烈抛头颅，洒热血，功勋卓著。

深泽县中共党组织始建于一九二五年。是年十月，王子益、许卜五等同志在南营民德小学建立了深泽县第一个共产党小组。他们以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发展党员，开展农运工作。一九二六年四月，党小组改为特别支部。六月，根据保定市党组织的决定，成立深（泽）安（平）饶（阳）中心县委。一九二七年，深泽县已建立了六个党支部，有党员三十多人。同年七月，成立中共深泽县委。

深泽县党组织建立之后，通过农民夜校、穷人会等，向广大贫苦农民进行反剥削、反压迫、反帝、反封建教育，并发动农民向地主和官绅进行斗争。如组织短工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开展秋收斗争，抗缴杀猪税，反对官府验契纳粮等。斗争多次取得了胜利。

在斗争中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到一九三〇年秋，全县已有党支部二十八个，党员二百七十八名。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共深泽县委根据上级党的指示，组织全县党团员一百多人，利用深泽城关庙会，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反贪官污吏的宣传。一夜之间，县城内外张贴和散发各种传单一万多张。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的官员惊恐万状，急忙关

闭城门，增加岗哨，严密警戒。

一九三三年四月和一九三四年二月，深泽县委两次遭到破坏，县委主要成员多人被捕，深泽县的党组织与保属特委失去联系。但是，许多共产党员仍在秘密地进行革命活动。一九三五年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在城内开办了“士林书社”以经营小学课本和其它书籍文具为掩护，秘密进行革命宣传。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日寇对我发动侵略战争，大批国民党军队闻风南逃。十月中旬，原国民党东北军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同志，按照我党指示，脱离国民党，改编为人民自卫军，于十月十七日进驻深泽。我县地下党组织积极配合部队开展工作，剿匪戒毒，发动群众参军、参战。一九三八年一月，中共深泽县委正式恢复，抗日县政府和县动员会建立。自此，在党的领导下，深泽人民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斗争。

“七七”事变后，我县各级党政群团武装组织相继建立，人民普遍发动，工农兵学商广泛动员，形成了在党领导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四日，我方按照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有计划、有秩序地撤出深泽县城，十六日，县城被敌占领。自此，党领导全县人民开始了以乡村为依托的游击战争。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日寇集中五万日伪军，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野蛮的“拉网大扫荡”，整个根据地被敌人占领，碉堡林立，沟路如网。敌人烧杀抢掠，实行残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先后制造了大兴、李家庄、耿庄、羊村等多次大惨案，残酷地屠杀我抗日军民。斗争十分艰苦。公开的抗日组织转入地下活动，坚持打击敌人。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形势逐渐好转，我军民积极地向敌人展开攻势，敌据点岗楼陆续被我攻克或迫退。一九四五年六月五日，日伪军弃城逃跑，深泽县城解放。

在八年抗战中，我深泽军民配合主力部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共击毙日寇一千一百多名，击毙伪军及

特务一千二百多名，俘虏日伪军一千五百多名，伪军投诚起义三百多名。在一九四二年六月九日有名的宋家庄战斗中，我军民与敌人血战十六个小时，毙伤敌人一千五百多名。这是我军反“扫荡”战斗中一次很大的胜利。

在八年抗战中，党是领导全县人民进行抗战的核心力量。全县党员和抗日干部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涌现出了许多象贺勤岩那样不畏敌人毒打，不受敌人利诱，被誉为“英雄的布尔什维克”的坚贞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

在八年抗战中，深泽县有一千四百余名抗战将士，为国捐躯。一九三八年底，冀中二地委宣传部长宋振恒，中共深泽县委书记何昆山，深泽县农会主任何福林，深泽县基干队政委张振安惨遭国民党顽军杀害。壮士就义时，临危不惧，威武不屈，大义凛然，被称为冀中“四烈士”。深泽人民将世代怀念他们。

在八年抗战中，全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共有八千七百多人参军，缴公粮一千六百万斤，副食三万多斤，军草四万二千多斤，做军鞋八万五千多双，做担架七千多付，挖地道六十六万多米，参加十万多人次，动土一百多万方，挖交通沟一百五十多万里，破路三百多华里。全县人民视抗日干部如亲人，用生命和鲜血掩护他们。段庄村女共产党员田玉春在家中挖了五个地洞，先后护理伤员二百多人。当敌人到她家搜查时，虽遭毒打而不暴露我方同志。她曾光荣地出席了晋察冀边区第二届群英大会。县委交通员赵永志同志在贾村遇敌，一个年轻的妇女把他说成自己的丈夫，使他脱险。这些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体现了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关系。

在解放战争中，全县人民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踊跃参军参战，踊跃支前，为推翻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王钰同志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我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古生物学会名誉理事王钰同志是河北省深泽县城内人，一九〇七年十月生。一九三三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解放前，历任农村复兴委员会地下水研究组调查员，中央地质调查所技佐、技士、技正，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六年在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博物院研究院工作。解放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无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第四研究室主任、古生物学报主编、地层学杂志副主编和代主编，还被提名为国际泥盆纪地层分会中国委员。

王钰同志从事地质古生物研究逾五十余年，发表过论著百余篇，深受地层古生物界同行的尊敬。早年从事地下水源和地质矿产调查，取得重要成果；解放初期，积极参加铁路和矿山勘探，为恢复国民经济作出了贡献。王钰同志从四十年代开始，重点转向地层古生物研究，特别是对长江三峡一带和川黔地区下古生界的研究成果，如《中国南方特马豆克层的初论》、《关于半河系》，《湖北峡东宜昌石灰岩的时代问题》等，更令人注目，为我国南方早古生代地层划分与对比，做了奠基性的工作。一九四五年后，王钰同志专攻腕足类化石的研究。他工作认真，学风严谨。一九四九年发表的《美国爱阿华上奥陶统 Maguoketa 组的腕足动物》一文，深得国内外同行赞扬，被破例编入一般只刊登国内论文的美国地质学会专刊第42号。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

初期，他先后主编的《中国腕足动物化石》（上、下册）和《腕足动物化石》，全国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奠定了我国腕足类研究的基础，推动了腕足学科的发展。王钰同志是我国腕足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提倡“系统采集，大量描述”，强调基础工作与生物地理学、生态环境学、形态功能学等的研究相结合。他偕后辈与国外专家合著的《中国志留纪、泥盆纪生物地理》和《晚奥陶世至中泥盆世腕足类群落生态》等论著已经或即将问世。在他的带动下，我国中青年腕足类学者正在成长起来。腕足类学科的研究，后继有人。这是王钰同志辛勤培育的结果，呕心沥血的结晶。

王钰同志在学术上的另一个主要贡献和成就是在地层学方面。五十年代初，他组队研究的《辽东太子河流域的地层》，改变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期间建立的旧的地层系统，纠正了许多错误，是解放后我国首次综合研究生物地层的主要成果，荣获中国科学院颁发的自然科学奖。他多次主持我国泥盆纪地层的研究工作，不仅主编了首次全面总结我国泥盆系的论文，还积极组织泥盆系的专题研究。以他为首发表的《中国南方泥盆纪生物地层研究新进展》和《华南泥盆纪生物地层》等文章，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重视和赞许。七十年代后期，他不顾年迈体弱，亲临野外，采集标本，注重底栖和浮游生物相地层的对比，使我国泥盆系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王钰同志是解放后我国泥盆系研究的带头人和组织者。

王钰同志是我国古生物学和地层学的两种重要刊物《古生物学报》和《地层学杂志》的主编和副主编。他以极大的热忱对待这项科学性、综合性很强的工作。他那孜孜不倦的工作态度和严谨认真的编辑作风，深深感动了编辑部同志，大家齐心协力，使这个刊物质量不断提高，影响日益扩大，发行遍及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王钰同志还热心科普事业，他所著的《化石》、《古生物

小丛书》等读物，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深受读者欢迎。

王钰同志爱护青年，奖掖后进。他勉励青年要“脚踏实地打基础，循序渐进攀高峰”。他教导青年选择课题，要实事求是，在考虑国家建设事业需要的同时，要“慎于选题，持之以恒，胆大心细，少留遗憾”。他对勤于工作、努力上进的后辈，总是有意给他们压担子，鼓励他们要大胆创新。在生活上，则多方帮助改善条件。他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批评时，严肃亲切。对待别人甚至后辈对他的批评，则虚怀若谷，勇于接受。他在晚年，主动让贤，积极把中青年推到学术领导岗位上去，并给予热情关怀和支持；他认真协助中青年组织专题研究，悉心指导，竭诚鼓励，而在署名时则居人之后；他常寄希望于青年人，表示要甘当引路人，铺路石。他多次谢绝国外的邀请，却利用他在国际学术界的声誉，为中青年出国考察和进修创造条件，并谆谆嘱咐他们珍惜时机，刻苦学习，积极进取，为国争光。在王钰同志身上，集中反映了老一辈科学家以培养接班人为己任的高尚品德，受到中青年的崇敬和爱戴。

王钰同志秉性刚直，襟怀坦白。对于违反党的方针、政策的错误现象勇于纠正，敢子挺身而出，很少顾虑个人得失，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优良品德。王钰同志平时生活节俭，但当国家遇到困难时，却慷慨解囊，积极捐献，支援国家建设。他豁达大度，严于律己，乐于助人，与周围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

我们要学习和发扬王钰同志勇于进取的治学精神和严谨不苟的科学态度，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

孙敬之传略

李慕真

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经济地理学家和人口学家孙敬之同志的一生，是为党的教育和科学事业献身的一生。他勤勤恳恳不知疲倦地奋斗了整整五十个春秋。以自己的心血和生命为党的科学教育事业增添了光彩。

一九〇九年五月，孙敬之同志诞生在河北省滹沱河畔的深泽县后马里村。他是当时大家庭中的唯一娇子。但他并没有被家庭地位、优厚的物质生活所吸引，而是选择了为广大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而奋斗终生的革命道路。他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满腔热情地为党工作。在教育战线上，他是广大师生的良师益友，在科学战线上，他是永不停步的尖兵。不论是在抗日时期的艰苦岁月，还是在建国以后的教授生活，他都是那样谦虚谨慎、克己奉公、忠于职守，以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生命当成一把抗荆斩棘的利剑，把挫折当作一块不可缺少的砥石。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早已炳耀神州，公论翕然，其影响远远超过国界。他把五十年来，用汗、用泪、用满腔热血浇灌起来的教育和科研成果奉献给了养育他的祖国。

早在保定育德中学读书时，他就开始接触进步思想，萌发了读书救国的信念。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后，他经常和一些进步同学为伍。国家民族的命运深深地牵动着这些青年的心灵。他主动热情地担任了夜校和平民学校的教员，希望在唤起民众、拯救危亡中尽到一点微薄的力量。一九三三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泊镇师范、天津女中、宣化中学等讲授地理课程。

他用生动的事例启发人们的爱国热情，深受广大学生的欢迎

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强占了京津和华北平原的广大地区。他凭藉朴素的民族感情，毅然离开教学岗位，绕道山西回到冀中平原，未曾顾及妻小，立即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先后担任了抗日呼声报的主编、涿北中学教员、安平县抗日政府秘书等职，活跃在抗日前线。一九三九年组织派他去晋察冀边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学习。此后便留校，成为华北联合大学的唯一地理教员。

敌后根据地的华北联合大学，是解放区的最高学府之一，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大熔炉。但是她没有校舍，没有成本的教材，也没有教学参考资料。不过在十年间，华北联合大学硬是培养出成千上万的钢筋铁骨的战士和革命的栋梁之材。孙敬之在华北联合大学任教期间，担任全部的地理课程，还和尚钺等同志一起开办了史地系，以培养地理方面的专门人材。在困难的游击环境里，他呕心沥血地编写教材。除参考自己带来的几本书外，还千方百计地寻找参考资料。每次反扫荡胜利后，他都兴致勃勃地去搜集一种另外的战利品，那怕是一张报纸，一本杂志，都珍贵地保存起来。他有一本日文的世界地图，那是从日本鬼子手中缴获的胜利品。为了尽到教师的神圣职责，他用最大的努力备好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去分析和认识事物，编出了几十万字的地理教材，用蝇头小楷写在粗糙的纸上。他们没有任何教学设备，他们的课堂在场院上，树林里、磨坊中。而他每次讲课都铿锵有力，用革命和科学道理鼓舞着人们的爱国热情，培养出成千上万的专业人材。根据地的游击环境，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少吃缺穿，他就和学员一起开荒生产，纺线织布，砍柴背米，行军还为体弱的同志背行李。在这种环境下的师生关系是尤为真挚的。直到解放后遇到一些两鬓斑白的老同志，还握住敬之的手，亲切地问一声孙教员好。他往往高兴地向我介绍说，凡是称我为孙教员的，都是抗日时期的学员。

北京和平解放以后，孙敬之同志穿着自己纺线织出的灰军装，作为“联大”的先锋队到了北京。在公务之余他常跑图书馆，各大学的地理系，搜集有关地理方面的教材和书籍，为承担更繁重的教学任务作准备。华北联合大学迁入北京后改为侧重经济学科的中国人民大学，决定各系科都要开创性的开设经济地理课。孙敬之同志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地写出百余万字的经济地理讲义。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确立经济地理学的科学体系和内容的地理讲义。当即被教育部指定为各高等院校的参考教材，并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同时，在他主持下还编写了中国经济地理、自然地理等课程的教材，为地理教学的革新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当时，国家为培养急需的经济地理人材，教育部责成他招校经济地理专业研究生班，每班四十人左右，几年共培养出几百名经济地理专业人材。现在，他们已是各该专业的骨干力量。为了满足教学的需要，他手把手地培养出一批年轻教师，而他自己还要给本科生，专修科研究生上课。在教学任务最紧张的时装他也一丝不苟，常常是通宵备课，天亮后擦把脸教去上课。这是他多年的生活习惯，是他高度责任心和事业心的表现。

不仅在教学上需要他承担繁重的任务，科学研究上也要求他挑起重担。一九五二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编写中华地理志。这是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之一，其中经济地理学部分就是由孙敬之同志担任主编的。他对这项国家任务担端严肃认真。在资料缺乏的情况下，他就组织部分同学实地调查。这部科学著作按全国十大经济区装写成十一分册，共计四百多万字，从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八年陆续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它是第一次向国内外全面展示新中国经济面貌和建设成就的科学著作，因此受到国内外的重视。一些国家已翻译出版。

孙敬之同志坚定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旧地理学教材中的一些形而上学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对经济地理学的

对象任务等问题提倡大家讨论。他认为这是繁荣科学、启发思想的正确方法。同时，他自己带头参加争鸣，写出《论经济地理学的科学性质》（商务印书馆出版）、《再论经济地理学的科学性质》、《三论经济地理学的性质》、《论自然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的科学性质及其相互关系》等多篇论文（均在地理学报上发表）。这样大大地活跃了当时的学术气氛。他主张经济地理学是研究生产力配置的，但对其他不同意见也均抱着客观的态度。他对苏联专家在态度上是友好尊敬的，但在学术问题上也敢于披露自己的观点，决不苟从。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科学的发展。

建国初期的五十年代，是他科研和教学工作的黄金时代。孙敬之同志的心，紧紧地贴着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解放了的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能现出来的冲天干劲，深深地露动了。他。为了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崛起，他象狮子一样战斗。他写出了近百篇论文，如《论经济区划》、《斯大林论地理科学》、《中国的人口和民族》等。这近百篇论文，大都是利用节假日休息时间撰写的。多少年来，他没有真正休息过一个节假日，许多论文是除夕之夜、国庆前夕写出来的。孙敬之同志治学态度严谨，所有论文都是自己动手。为了一个数据、一个事实，往往要核对好久。每篇文章都修改几次，直到确实准确无误才肯罢手。

孙敬之同志尽管在教学和科研上任务繁重。但还承担了许多社会工作。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九年，他曾担任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和党组书记等职，组织过多次学术讨论会。一九七九年以来他还担任全国经济地理科学与教育研究会理事长、北京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等职。他积极组织和参加各项学术活动，对促进学科发展起了显著作用。

在五十年代，党和国家常派他出国访问或参加学术会议。一

九五三年初，孙敬之同志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地理学代表大会，会上宣读了《中国地理学发展简史》学术论文，受到国际朋友的欢迎。一九五五年底，他作为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去印度阿里迦参加国际地理学会，会上宣读的论文《食物来源与人口增长》受到与会者的重视。在这次会议上他被推选为国际地理学会副主席。一九五八年率代表团去民主德国，参加纪念洪堡德的大会。他的历次访问，结交了许多国际朋友，加强了国际学术交流。

孙敬之同志由于在教学上与科学研究上取得了突出成绩，早在一九五三年就被评为三级教授。但是他的本色未变，仍以普通教员身份出现，处处平易近人。同志们反映他没有一点架子。正当他满怀激情向科研和教学高峰奋疾攀登的时候，他和广大知识分子一样也受到种种磨难。一九五九年以他思想右倾受到严重迫害，被逼成反应性精神病达两年之久，险些丧失生命。但他坚信党中央，他一面积累资料继续搞科学研究，一面积极向中央反映情况。一九六二年党中央为他恢复了名誉。他对党没有任何怨言，对整过他的人也是宽宏大量的。然而他的身心却受到了严重的损伤，患了高血压、心脏病、神经衰弱等症。

孙敬之同志热爱自己的工作，更热爱祖国。一九六六年，当地处大西北的兰州大学向他发出召唤时，他不顾年老多病，毅然举家西迁，决心为建设大西北贡献自己的后半生。当时他任兰大地质地理系主任。到任不到一个月，即率领队伍去河西走廊的商公县搞农业区划。令人神往的河西走廊啊！孙敬之同志凭虚极目，不禁思绪万千。这里曾有“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英雄，曾有“大雪满弓刀”的将士，曾有“沙场秋点兵”的古战场，也曾有“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喟然长叹！他似乎听到了中世纪茄音犀鼓已变奏成开发大西北的战斗号角！为春风度过玉门关，为天涯芳草长绿，他兴奋地描绘着河西走廊农业发展的蓝图，也